

大城山  
城市地质景观

□ 檀桂存

近日,市民政局发布唐山市第一批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中著名自然地理实体有两个:大城山和景忠山。这里说说大城山。

大城山曾经是浅海,后来隆起成山。大城山的岩石为沉积石灰岩,石灰岩是沉积岩的一种,既然是沉积岩,一定形成在低洼处,水往低处流,流水携带泥沙碎石等物质流到低洼处,才能沉积,沉积下来的松散物质,经过亿万年固结、成岩,才形成沉积岩。根据地质理论,石灰岩一般形成在浅海环境,浅海当然低洼;另据沈括在《梦溪笔谈》记录,太行山发现了蚌壳等生物遗迹,证明太行山曾经被海淹没,后来成山。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平原距离海洋更近,海侵时代被海水侵入成海。

距大城山20公里的唐山市丰南区宋家营村建有一座望海寺,说明历史上这里可望海,而今天的宋家营村距离渤海已经有40公里;同是丰南区的刘大官村和大吴庄,发现了高5米绵延约4公里的古贝壳堤(牡蛎堤),如今这些村子距离渤海已有相当的距离了。这些案例都说明了唐山地区沧海桑田的变化。

位于大城山东南麓的原启新水泥厂,因为环保要求已搬迁,原厂改造成为工业遗址,并已打造研学实践基地。从地理学角度看,原启新水泥厂之所以选在这个位置建厂,是因为水泥的主要原料是石灰岩,而大城山岩体主要为石灰岩,启新水泥厂是一个原料指向型企业。离水泥厂不过数里,就是开滦煤矿,水泥工业的燃料问题,可很方便地解决;启新水泥厂自己建了发电厂,电力问题也得到解决。当时的厂址选择可谓占尽了地利的优势。

从启新遗址沿河西路北行到大城山东园北侧沉积岩崖壁,不过数分钟行程。通过微尺度的观察,可以看到沉积岩明显的层理构造,岩层的沉积基本是水平的;而大尺度的观察可见,这里的岩层向上拱起成背斜构造,说明岩层受到了挤压并隆起成山。这个地质现象在城区十分少见,是难得的实践教学景观。

“学科实践”学习方式是当下我国教育课程育人范式的新方向。从课本学习理论,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实践,并走向实践教学,是中学教育改革的大方向。基于此,实践研学也在各地蓬勃开展,唐山地区的研学实践基地已经逐步建设起来,大城山作为绿道的节点,是市区地质教学不可多得的实践研学场所。利用好这一场所,不仅仅利于广大中小学生学习地理知识,而且有利于他们进一步了解家乡,培养爱家乡、爱祖国的家国情怀,利于他们更加茁壮地成长!



如今,如果有谁说,一名工人能被保送上大学,并进入中国美术最高学府中央美术学院,那一定会被斥为“天方夜谭”。

不过,咱先别抬杠。2002年,我曾两次专访过的乡兄张步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进了中央美院,还拜在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门下,成为可染先生弟子中第一个自成风貌的强者,对李(可染)派山水的创作与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但这事不是发生在当下,而是20世纪50年代。

张步先生1934年出生在丰润县一个贫苦农家。上小学时,教室是由关帝庙改建的,他喜欢墙上桃园三结义故事壁画,一有时间就趴在桌上描摹。他父亲有木工手艺,尤以雕花、彩绘见长,他常跟着大人在家具上描画,释放着与生俱来的“天性”。稍大,父亲说:“小子,总在箱子上画哪行,长大有出息到唐山缸窑(指瓷厂)去画茶壶,那才叫真能耐呢!”张步先生说,后来他缸窑没去成,1950年,却被招工当了电业工人。

1954年,在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他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工农速成班学习。张步先生把这比喻为“天上掉下了块大馅饼”。4年后,本可以定向到清华大学机电系学习,但是出于对画画的良好,他鼓起勇气提出

## 他从工人中走来

□ 刘士裕

弃工从艺的请求。当时中央美院已经放假,而学校还是为一个人设置了考场。张步先生清楚地记得,现场发挥时,他画了一幅梅花图,随后在命题创作中,画了一张表现建筑工地热火朝天劳动的场景:迎风招展的彩旗、来往穿梭的工人,中间还画了几头沿着脚手架搭起的斜坡向上驮砖的毛驴。评委们看后笑了:“小伙子还真有想象力”,并当场宣布:“祝贺你被录取!”张步的眼眶顿时湿润了。

其实,张步先生的大学生活,并没有吃馅饼那么快意。他说:“当年中央美院国画系只招收10名学员,大部分是中央美院附中毕业的,对美术已初窥门径。在这种氛围里,我仅凭在箱子上抹些花草草这点‘家底’,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幸运再次落到张步先生头上。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央美院李可染、李苦禅、叶浅予、蒋兆和等教授都在一线授课,教学环境较为宽松。但终究因为基础差,他入学后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总是倒数第一二名。然而老师并未因此对他另眼相待,反而关照有加。上课时手把手地教,课后又给他吃“偏饭”,有时还把他带到家里单独辅导。每谈及此,张步先生始终按捺不住感激的心情。

在张步先生人生最关键时刻,他遇到了一位贵人:恩师可染先生。两年基础课后,他有幸在李可染工作室专攻山水,成为可染先生少数几位入室弟子之一。两年下来,进步很快,毕业时,他的《峨眉清音》等4幅作品

参加了学校毕业创作展,成绩已经排得比较靠前的了。1963年从中央美院毕业,张步先后在《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任美术编辑,1980年又进了北京画院,做专职画家,后任副院长。在此期间,他仍追随可染先生研习山水画,到全国各地采风写生、旅行考察,20载寒暑易节,时时得到先生耳提面命。

在求艺的道路上,不会总是平坦的,也会有泥泞和坎坷。张步先生说:“不论什么情况下,可染恩师始终都是我的引路人”。遇到困难时,可染先生给他以鼓励,告诫他“不要怕艰难险阻,不要怕失败。要如同走夜路一样,小心地去探索,画画可不是‘探囊取物’般的容易”,并为他题词:“痴思长绳系日——此白石老人自励印语,与张步学弟共勉”。为了铭记在心,他将题词贴在床头,并赫然印在《张步画集》扉页上。

在翘尾巴时,可染先生又不断警醒他。张步先生还记得,“一次到先生家里,老师见我有些‘浮’,便深情地说:你还年轻,趁精力旺盛多跑多画,还要下几年苦功夫钻进去。后来看到可染先生‘七十始知无知’‘白发学童’两方印章时才恍然大悟。自己已经70多岁还把自己比作学童,我辈有什么理由自满呢?”

感到困惑时,可染先生总是及时引导,指点迷津。在他取得一定成就,为如何进一步发展而苦恼时,可染先生意味深长地说:“困难和缺点是永远存在的,当你感到顺风顺水之日,正是你

停滞不前之时”,鼓励他总结不足,在修正和充实中不断创新。

张步先生没有辜负恩师多年来的教诲和期望。20世纪70年代数年间,他独创“浓墨重彩”画风,《金色豫南》《神农架奇观》《版纳竹乡》《中华之魂》《春风又绿江南岸》等作品一出手,便受到美术界的瞩目和广泛赞誉。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从既定风格中“脱壳”而出,首开意象山水先河,从逼真描写外在世界,向深层次开掘,以《生命之歌》《天山之魂》《白马天堂》等作品为标志,展现

出更为自然洒脱,更为抽象夸张,感情思绪更为随心所欲的新境界。

张步先生常说:“知我者莫过吾师”。在《张步画集》中,我赫然看到可染先生这样一段文字:“张步自幼喜画,环境非优越者也。终以工人而成画家,刻苦自励,勤勉不辍,是其过人之处;张步虽一向善思,聪敏非超群者也。竟以渐积而悟有得,探真求实,精诚专一,是其不凡之处。天道酬勤,功不负人,其人从善,其艺也佳。”

恩师言之真真,其情也切切。



张步

## 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

——简述从《救国报》到《唐山劳动日报》的烽火岁月(15)

□ 王烁辉

(接上期)

## 7.《救国报》分社与地方版的发展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了解一下《救国报》分社与地方版的发展情况。

1943年春,由于游击根据地的范围已经大大突破了冀东的地域,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决定:撤销中共冀东地委,建立中共冀热边特别委员会(简称冀热边特委);撤销晋察冀边区第十三专员公署,建立冀热边行署。

特委行署下设5个地区委和5个专署,辖19个县(联合县)。5个地委分别出版《救国报》的地方版,作为该地区的地委机关报。各地地方版都有自己的报社,负责编辑、印刷、出版发行工作。这些地方版,在各地地区委的领导下,经过报社同志们的努力,很快就成为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报纸,有效地配合了本地区的抗日斗争。

## 《救国报(滦西版)》与滦西分社

《救国报(滦西版)》和《救国报》滦西分社的故事,要从1942年秋天讲起。

那时,日寇在冀东的“治安强化”活动尤为疯狂,在冀东西部将矛头指向盘山和蓟县,平原地区几乎全部被蚕食。这时,党组织派王雪松到蓟县三联合县加强宣传工作。王雪松独自来到桑树鞞、大红峪一带,先是翻印了两期《救国报》,向群众进行宣传。随后又建立了两户堡垒关系,很快便同老乡熟悉起来,还和桑树鞞一家堡垒户崔大娘的儿子崔盛结为生死之交。

10月底,敌人集结兵力,进山实行“三光”,并将老乡圈下山去“集家”。崔大娘的房子被烧后,崔盛坚持不下山,和王雪松一道,白天扎在山林里隐蔽,夜间住在山洞、炭窑里。这期间,崔盛点松明子照亮,王雪松编写消息,隐秘地刻印抗日宣传文章。消息的来源是附近几村党支部负责人,如:大红峪的白恩、桑树鞞的李福贵、崔庄的岳华等同志,经常来找他们传递群众反“集家”斗争的情况。同时,设立了秘密交通站,由桑树鞞的李景芳担任交通员。李景芳为人机敏,工作能力很强,不但保证了来往转送报

纸、信件畅通,还能打探到比较广泛的消息,这些消息经由王雪松写成稿子及时刻印。由于不便使用油印机,崔盛便用拇指蘸油墨往蜡纸上抹,再一行行地印在小块白纸上,他们给这份材料起名叫作《救国快报》。为扩大宣传,三人还翻印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今年打败德国,明年打败日本”的宣传品。虽然每次只印几十份,然而发到集家村去,对鼓舞群众的抗日斗争情绪、坚定必胜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了腊月,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为便于工作,王雪松、崔盛、李景芳便一起活动了,尖山子背后陡壁上的一个狼洞,成了他们经常居住的“保险地”。通常是李景芳上山放哨,崔盛做后勤保障,王雪松找几个背风阳坡写稿件,刻钢板。没有住处,又缺吃少穿,可三人就这样艰难却义无反顾地坚持到1943年。此后,因王雪松调赴边北工作,这项工作才中止。

1944年2月,春节已过,大地回春,万物向荣。第一地区委选调30多名干部和工作人员,奔向平谷的福吉卧(今属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北寨村,福吉卧自然村已搬迁)——《救国报》滦西分社在这里成立了。

冀热边第一地区委书记李子光兼任社长,宣传部副部长王坤载任副社长兼总编。最初报社没有专职记者,消息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由电台接收新华社的电讯稿和《救国报》电台发来的电文;二是各县县委书记及宣传部门写来的约稿;三是转载冀东军区政治部主办的《尖兵报》消息和文章。

分社人员编制相对完善,即:编辑组,主编高昌和见习编辑陈大光;电台组,任和家、张景福还有背电台的郭福堂、包万海;译电组,杨晓峰、苏健和张文清;刻印组,王雪松、墨耕、国章、周新华、徐耀青、华东、王绍文、刘志远,再加上交通班、警卫、伙房人员,共有30多人。

第二版登载了新华社和冀热边特委指导当前工作的文电及地方消息。

从此,《救国报(滦西版)》活跃在冀东西部的蓟遵兴、平三蓟、承兴密、丰滦密各县。由于环境的游击性,报纸是不定期的,一般情况下每周出刊两三期,每期出几百张,将延安的声音传送到各县、区、村,第一地委党政机关及解放区抗日军民及时看到了上级指示和我军作战的胜利消息,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初创的分社条件简陋,只有两部油印机和一部简易电台。由于敌人的封锁,物质条件也是极端困难,许多人只有一身衣服,冬天是棉衣,夏天得把里面的棉花掏出来当单衣穿。可同志们患难与共,精诚团结,他们与群众关系密切,男同志给房东挑水、上山打柴、春忙抢种;女同志扫院子、做饭,并用节约下来的粮食帮助群众度荒。老乡们也真心实意地支持分社的工作,白天帮分社放哨,夜晚转运物资,给报社掩藏纸张、油墨、油印机……收藏印刷设备的山洞阴冷潮湿,油墨变质无法使用,同志们便找老匠人学习,搜寻身边可用的材料,自己研究造油墨。《救国报(滦西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的。

4月初,王坤载调走,任朴从《救国报》总社调来分社任总编。任朴,原名鲍润普,河北丰润人,1940年毕业于晋察冀边区联大鲁艺,从1941年初便任职于《救国报》,和雷焯一起从事战地记者工作。任朴性格沉静、工作细致,平时话语却又幽默诙谐,他的到来丰富了同志们的办报经验,使报纸质量显著提高,也给滦西分社增添了不少活跃气氛。

任朴喜欢找同志聊天,所以到分社不久就掌握了同志们的工作生活情况。他见很多同志因常年坚持在“蚕食”区工作,日夜钻洞,久不见阳光,以致营养不良,体质虚弱。便设法弄到了一个旧篮球,从此在工作繁忙精神倦怠的时候,同志们能跑到空场欢蹦乱跳地打上一场球,一扫疲惫。任朴在滦西分社工作了半年左右,后被冀热边特委调去天津做敌后工作。

1944年夏天,全国各个解放区突飞猛进发展,冀东西部形势也随之全面好转,盘山

抗日根据地工作日益活跃。《救国报》滦西分社的同志们,辞别了福吉卧的乡亲,向盘山附近活动。编辑室、刻印组转移到新开峪,电台、译电组住在酸枣峪。入秋,敌人凑集伪满军八个大队,约计三四千人配合地方伪军,向平谷川、福吉卧和鱼子山一带山地进犯。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他们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同敌人周旋了半个多月。在这次反“扫荡”中,一名刻写员因病未离开新开峪而被捕,滦西分社所在地暴露,于是分社决定转移八里沟。

八里沟地处白洞、段甲岭北山,西邻前后蒋山、栲栳山等抗日工作基础较强的几个山村,往东登上老爷岭与盘山相望,北出早石龟沟就是平谷夏各庄。这里山不高,林不深,却是一处不大引人注意的幽僻地方。分社迁来时已是9月份了,编辑室住八里沟,电台和译电组住八里沟南上坎,刻印组住在八里沟东北相距四里地的大岭后。这时,高昌调回地委宣传部工作,高元由《救国报》总社调来任主编。陈大光、王义民和王雪松任见习编辑兼负责版面工作。张景福调出报社;先后调来任子易、高壮飞负责报务。译电组张文清调走,调来金振华(即王国振)、仇浩忠充实了力量。经过一番组织整顿、明确分工,从编辑室到各组实行流水线作业,形成了有机的整体,提高了工作效率,编辑、收译电报、刻印工作都得到了发展。

1944年秋,被敌人“蚕食”的蓟县平原基本区得到恢复。敌后解放区的环境渐趋平稳,同志们在八里沟、大岭后度过了寒冬。

1945年1月,冀热辽区党委成立,原第一地委改为第十四地委。春节过后,大地回暖,和煦的阳光照射着解放区的崇山峻岭和蜿蜒的万里长城,《救国报》滦西分社转移到盘山。编辑室、电台住黑塔岭,刻印组住古中盘。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救国报(滦西版)》此时每周出报三至五期,并且由八开两版增为八开四版。同时,于2月1日发出创刊号,增编了新闻周刊《救国汇刊》,以补充报纸版面的不足。周刊的内容大体分为:专论,登载国际、国内大事专题论文;专载,刊登国内外具有新闻性的重大事件;时评,关

于国内外的时事评论。

4月,天气和暖,万物欣欣向荣,分社迁到千像寺(今属天津市蓟州区)。当地民兵与乡亲们千像寺给分社盖了房子,借正殿墙框盖了一间编辑室;正殿东边,靠石坝台盖了四间前出水的刻印室;编辑室西边用庙基条石搭的一间石房,经加工整理,安了电台。

在这里,分社的同志们抓紧工作,挤时间轮流下地,跟群众一起打垄,担水,插秧。巍峨的九华峰下,幽静的千像寺山谷中,不时回荡着大家一起努力生产的欢声笑语和阵阵抗日歌声,每个人都在向往着美好的前景并努力为此而奋斗。

8月9日凌晨,分社电台收到了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全国人民对日寇进行全面大反攻。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军队发布抗日大反攻的总动员令;进击日寇控制的各个城市交通线。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历经战争痛苦的中国人民,都在热烈地狂欢庆祝伟大胜利。

9月2日,日寇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之后,分社全体同志齐聚平谷县望马台村,进行几天休整。根据地委意见,分社随地委机关向北平靠近,决定迁往顺义县的虫王庙。

9月20日,三河解放了。我军从三河印刷局接收了脚踏铅印机、手摇石印机各一台。地委书记李子光很关心报纸工作,派人把机器运来之后,又亲到分社指导工作,他指出:“当前形势发展很快,宣传工作必须赶上,要扩大报纸发行量。”从此,《救国报(滦西版)》改用石印,无论印数和重量都比油印前进了一大步。同时,报纸更名为《群众报》,仍是十四地委机关报。

1945年底,高元调任《救国报》总社,丰原调到《救国报》滦西分社任总编。

1946年5月《群众报》终刊。同时,《救国报》滦西分社改为新华社第十四支社,负责向《冀东日报》即新华社冀东分社发稿。至此,《救国报(滦西版)》光荣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待续)